



为什么 20 世纪 是美国世纪

〔美〕 奥利维尔 · 如恩斯 著

WHY THE
AMERICAN
CENTURY

新 华 出 版 社

为什么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

[美] 奥利维尔·如恩斯 著

闫循华 梁 泓 张春波 译
张立刚 张鸿斌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 / (美) 如恩斯著; 闫循华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1-5572-0

I. 为… II. ①如…②闫… III. 政治制度 - 研究 - 美国
IV. 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102 号
京权图字: 01-2001-4848

WHY THE AMERICAN CENTURY

by Olivier Zunz

Copyright © 199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为什么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

[美] 奥利维尔·如恩斯 著
闫循华 梁泓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3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572-0/D·900 定价: 21.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MBASE/13

献 辞

谨以此书献给我儿时心目中的英雄：

伯纳德·奥斯捷（1931 - 1958）

帕特里克·如恩斯（1943 - 1993）

中文版序

值此中文版即将刊行之际，我亦有机会重新审视本书之精神主旨。

仅仅半个世纪以前，即 20 世纪 50 年代，大多数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仍以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为骄傲。他们将目光放在美国所谓永恒不变的特征上，如机会均等、实用主义等，以此来解释和称颂这种美国模式。这些所谓共识论史学家赞同美国例外论的观点，认为这是美国二战之后经济繁荣、国力超群的原因所在。

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国内外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纷纷指出，美国的模式存有不足之处。他们抨击大众文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后果，批评美国的海外政策盲目、有缺陷，谴责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以及国内对人权的侵犯。

此外，少数学者还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历史，他们同样淡化了所谓美国例外论的观点。

在《为什么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一书中，我同上述三种流派保持了距离。我无意对美国的体系进行褒贬，而着意找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架构和美国跃居为世界强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比较历史学的精神指引下，我探讨了在别国亦有类似条件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 and 意识形态是如何结合起来，使美国的精英们得以在国内创造经济繁荣，并扩大了在全

球范围的影响力的。

我的目的是要发掘美国的社会变迁同其世界主导者地位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不仅是欧洲自我毁灭的结果。美国跃居世界强国地位，依靠的是国内科学和工业领域的一系列独特成就，以及它对本国社会进行的谨慎的重新整合。本书主要涉及二战之前的五六十年，主题是美国精英们如何界定美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群体，所应该走的道路。

本书展示了美国精英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创建自由主义模式时所面临的挑战，探讨了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我重新梳理了他们为创建一个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大众社会所进行的辩论，并对他们所付出的努力进行了分析。

我又进一步考察了美国人如何将他们的理念输出到国外，尤其是战后的日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我有意对“美国世纪”和“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作了区分：前者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后者则指美国对其实力的运用。当然，我也意识到，世界上很多感受到美国力量强大冲击力的人们根本无法对二者加以区分。但反之，大多数 20 世纪的美国人不用去考虑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照样活得很好，也未料想到美国国内所争论的问题会同样在别国出现。

我认为，虽然美国在世界上使用其强权并导致纷争不断，但“美国世纪”这一观点却经受住了考验。美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主张国家富足、个人自由、个人福祉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并成功地把实现这种联系变成了一项世界性的日程。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议程，而且正处在实施过程之中。本书所做的就是要发掘其历史重要性。因为，不论对其是满口赞同，还是不置可否，抑或轻蔑不已，不仅美国人，而且世界上的许多人都不得不与赫伯特·克罗利所描绘的“美国的灿烂前景”以及亨利·卢斯所谓的“美国世纪”打交道。

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奉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在此，我衷心感谢闫循华及其合作者将此书译成中文，衷心感谢新华出版社刊行本书之中文版。

奥利维尔·如恩斯 (Olivier Zunz)
2001 年 2 月于弗吉尼亚夏洛特维尔

前言：“新巨人”^①

治理和发展美国本身，是我们头一百年中发展的基调，而我们下一个世纪的基调则是本国的管理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

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1900年^②

1941年2月17日，《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在《生活》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这一社论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共鸣。虽然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还是9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但卢斯此时便力劝美国人参加二战了，认为美国的文明将在这场反对独裁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卢斯深受其曾在中国传教的双亲影响，对天定命运^③（manifest destiny）论笃信不疑。出于这种信念，他在社论中主张美国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认为充当世界领袖将是一个“创造性的机遇”，可以将美国的“民主原则输出到全世界”，以便巩固国内成就。卢斯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与工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敦促美国人认识到其自身

① 本前言的题目是从埃玛·拉扎勒斯著名的十四行诗中借用的，该诗于1886年作为自由女神雕像的铭文，镌刻在了雕像的底座上。

② *Congressional Record*, 56th, Cong., 1st sess., 1900, 33, pt. 1: 710.

③ 亦作“显然天命”，19世纪鼓吹美国对外扩张乃天命所定的一种说法。（译者注）

的福祉同全世界的自由休戚相关，激励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迎接挑战，不负其作为世界“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民族”的地位。无论美国先前多么希望超然于世界事务之外，但它现在却再也不能特立独行了。^①

此前的数十年中，美国的精英们一直力图阐明，美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群体，负有相应于其历史天赋和局限的历史使命。当这些美国精英跨入 20 世纪时，他们仍面临着两项未竟的庞大任务。首先是在美国大陆范围内创建工业经济。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美国人需要发明赖以开发和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科学技术，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需要重新配置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需要投资搞科研开发，以及找到能使美国人更好地为国家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社会组织策略。然而，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人们却褒贬不一，许多对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可能丧失而忧心忡忡。持乐观态度的是“现代化论者”。例如，时间专家弗莱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就曾于 1911 年信心十足地断言：“过去曾经以人为先，将来却是体系为重。”但另外一些美国人则不那么乐观，他们对人不得不受制于大规模的生产、销售体系并失去个体性而深感忧虑。^② 伍尔多·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不安地意识到，美国人的交往中日益涉及一些“基本上没有人情味的东西”。于是，他 1913 年开始倡导“新自由”，以

①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February 17, 1941, 61 - 65. 有关卢斯的生涯，参见 James L. Baughman, *Henry R. Luce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7). 吉布斯模仿卢斯的口气，为《纽约人》杂志写了一篇有趣的东西，参见 “Time... Fortune... Life... Luce,”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8, 1936. 重印于 *Parodies: An Anthology from Chaucer to Beerbohm - and After*, ed. Dwight Macdona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338 - 51.

②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1911; New York: W.W. Norton, 1967), 7. 另见 Robert Kanigel, *The One Best Way: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and the Enigma of Efficiency* (New York: Viking, 1997).

拯救个人主义于危难。^① 威尔逊对剧变将临的担心在海外也得到了回应。安德雷·齐格弗里德 (Andre Siegfried) 在其所著《美国长大了》(1927) 一书中流露了同样的忧虑；他在书中写道，美国人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产生活观念”。^②

20 世纪来临之际，美国人追求的第二个宏伟事业就是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拓展。因为甚至到了 19 世纪末，即仅仅一百年前，民主仍未真正成为美国大众的民主。只有白人中的男性才充分享受了宪法中倡导个人自由和自治的民主原则的种种好处。要让全体美国人，特别是妇女和少数民族，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美国，尽管南北内战结束后有过激进的重建计划，但获得解放的奴隶事实上一直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美国许多地方还从法律上确立了种族隔离制度。

对这两项事业的推进及其潜在后果，美国人恐怕各有各的看法。进步党杂志《新共和》最早的主编之一赫伯特·克罗利 (Herbert Croly) 在其处女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美国生活的灿烂前景》(1909 年) 中，提出了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③ 克罗利不相信经济结构重组会妨碍 18 世纪各种理想的实现。他提出，体制革命有可能缔造出一篇新的《独立宣言》。克罗利乐观地认为，新兴的创造大量财富的手段将对时代的道德取向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且相信“由于美国人有能力过上更为舒适自在的

①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A Call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Generous Energies of a People* (Garden City: Doubleday, Page & Co., 1913), 7.

② Andre Siegfried, trans. H. H. Hemming and Doris Hemming, *America Comes of Age: A French Analys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7). 所引述之处仅见于其法文版的前言, 见 *Les Etats - Unis d'aujourd'hui*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27), 2. 该书是受法国社会博物馆委托而写。

③ 另外两人是沃尔特·维尔和沃尔特·李普曼。有关《新共和》杂志的创立, 参见威斯特布鲁克 (Westbrook) 的说明, 载于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 ed. Richard W. Fox and James Kloppenberg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490 - 92.

生活，他们的社会也将变得更美好，而且总的说来，他们将会成为人类中更有价值的一个群体”。^①当大约四十年之后卢斯重提“美国的灿烂前景”时，克罗利所预见的许多变化已然成为现实，美国业已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虽然经过“伟大战争”（即一战）之后，德国一败涂地，法国精疲力竭，英国工业萧条，但是美国的崛起并非只是欧洲衰落的结果。^②其实，正如卢斯和其他评论者所认识到的那样，美国的兴盛一方面得益于它在科技和工业领域取得的大量原创性成就，另一方面得益于它同步对美国社会进行的谨慎的结构重组。

打造和输出美国模式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种美国精英已经把美国定位为全球大众社会的霸主。他们相信，依靠新的组织技术和各种社会秩序准则，他们已经根除了美国大众社会的动荡隐患。他们根据各自对美国历史的特殊体验，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念与方案，正是这些构成了本书的主要议题。我的目的在于揭示“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形成的缘由，并无意从商业或军事的角度赘

^① Herbert D.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1909;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12.

^② 有关美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变化，见 Akira Iriye,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 - 1945*, vol. 3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是如何得以实现的。^①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但不是一回事。前者属于意识形态建筑，在美国人眼里，可以用来说明美国干预世界事务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实施过程。本书因此对“美国世纪”和“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通过区分这两个概念，说明它们归根结底是如何互为支撑的。美国人实际上先制造出了他们所需要的“美国世纪”这一意识形态，只是到二战结束后才将其强加给百废待兴的世界。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理清大企业、政府以及日益壮大的高教领域如何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建立起伙伴关系，从而共同创造和管理一个新美国的。在这种由公司企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基金会共同组成的崭新的科研体系下，知识的创造者、推进者和应用者三方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共同发展出一系列认知策略。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已经牢固确立起来，并且在整个20世纪不断得到强化（见第一章）。这一科研体系是“美国世纪”的先决条件，因为正是知识的重新组合，而不仅仅是资本积

^① 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是“孤立主义”学说的主要批评者。参见其1959年之作品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72), 31, 177, 238。威廉姆斯吸收其学生的成果，尤其是下列几个：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 - 189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和 Lloyd C.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以及 Thomas J. McCormick, *China Market: 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 - 1901*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7)。有人对威廉姆斯的方法作了进一步改进，即把美国外交主要看作国内利益之争的结果。一些历史学家根据这一改进，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公司式”模式，来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参见 Thomas J. 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0 (December 1982): 318 - 330, 以及 Michael J. Hogan, “Corporatism”, i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ed.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6 - 36。

累的力量，赋予美国在创造国内繁荣的同时在全球扩大影响的资力。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推动了一战期间美国大型军工综合企业的建设，促进了以技术为本的消费经济的形成，推动了消费的巨大发展。

科研体系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推动了社会工程^①（Social Engineering）和政策导向研究。基于对“社科智能”的新信念，他们发展出各种行为研究技术，为组织大众化社会提供了原始数据。他们还将统计方法转化为研究和看待大众与个人的手段之一。虽然 20 世纪 40 年代，时任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仍在喋喋谈论“普通人”，但他心目中所指的早已不是杰克逊时代^②的美国城镇居民，而是抽象的“普通”中产阶级。这一中产阶级形象，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成百上千次调查和研究总结出来的。（见第二、第三章）

随着队伍的壮大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成了“美国世纪”的标志。所谓“美国式典范”的理论范式在理念上的重大突破就是，中产阶级社会成了社会的理想典范，工人阶级社会则与此无缘。美国因而无需采纳马克思主义，倡导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则成为了它的选择。美国的决策者们视拓展中产阶级为国之要务。他们认为，充分参与大众市场不仅是一项民主权利，还能有效地抹煞 19 世纪以来存在于蓝领与白领工人之间的差别，为市场模式赢得信誉。这一模式从理论上讲，能够消除阶级的激进色彩，后来变成了美国所领导的战后经济秩序的核心原则。在探究其成因时，我把重点放在了二战期间，企业管理人员、劳工领

① 此处“工程”指对技术原理的实际应用，就“社会工程”而言，是指运用有关社会的各种知识原理来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译者注）

②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 年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政治主要反映了新兴的中小企业主、商人、农场主、工人和土地投机者的愿望。（译者注）

袖以及政府官员为使市场转而服务于社会契约而共同制定的大众消费政策上。(见第四、第五章)^①

这些市场手段有效地促进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抽象意义上的普通美国人的需求，一些个人和群体的愿望和渴求却因套不进简单化的公式里而被有意忽略了。同时，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成份复杂的巨大的中心，其同化能力大有泯灭公民个性、孕育出一个人人趋同、个个蹈矩的规范化社会的危险。^② 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这种种情形，以民主须有包容性的名义，极力倡导尊重个体差别的多元主义思想。法国政治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③就深明社区生活对 19 世纪非中心化社会的重要意义，认为“自愿主义”(Voluntarism)能够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程度。20 世纪的美国人发现，就新兴的官僚主义的大众社会来说，多元主义(Pluralism)不失为一条解决之道——尽管它是一条存在着严重弱点的解决之道。

美国教派的百花齐放对美国接受多元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因之探讨了 20 世纪美国的各教派是如何变得更为宽容的。正是在这种宗教宽容的背景下，信奉清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的美国人得以同在一个大众社会中而互不相扰，保持着各自的身份认同、观念看法和政治生活(见第六章)。但是在消除歧视方面，宗教团体的表现并不比工商、教育和政府机构好多少。多元

① 这样我就完成了自己在另一本书中所开始的研究任务。参见我的 *Making America Corporate, 187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② 这是引发了全国性讨论的情况之一。另外参见 David Riesman, *Reuel Denney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③ 托克维尔(1805-1895)，法国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1835-1840 年间发表著名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对 19 世纪初的美国政治、社会制度有深入独到的分析。(译者注)

主义最终变成了中产阶级成员之间的一种松散的社会契约，而那些达不到普通水准的美国人则被拒于契约之外。其结果，自从第一次重建（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过程）以来，所有为争取自身权利而不得不分外努力地奋斗的美国人，如非裔美国人、妇女和工人，在追求自我实现时，就越来越注重采取集体行动战略，共同责任的光芒盖过了个体的追求（见第七章）。

作为主流阶层，美国中产阶级在创建以知识为驱动力、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主义模式的同时，还听从了卢斯的建议，致力于通过输出自己的基本观念和行为准则来保障美国的繁荣昌盛。但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他们大大低估了这一任务的难度。因此，我在本书的末尾探讨了日本二战之后重建的历史，因为日本几乎可以说是美国在海外移植美国模式的实验室（见第八章）。在占领日本的7年中，美国人几乎一手制定了所有重要的决策。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是我唯一可以找到的最为贴切的例子。它既有助于了解美国人对自己在两战之间所构建的美国模式的看法，又有助于人们看清该模式内在的矛盾。在日本个案上，我关注的是“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推行过程中，“美国世纪”这一观念得以再孕育和再创造的方式。

谁是书中的“美国人”

“美国世纪”自有其编年者和演员。他们都属于一个松散的精英阶层，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他们全都觉察到国内外存在的挑战，相信进步，相信有必要保持现代大众社会的民主特质。尽管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身份地位、为人处事都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可归入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之列，而且他们人数越来越多。自19

世纪70年代以来,这批人一直在寻找一条介于自由放任主义^①和危险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不论自由放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所欠缺,自由放任主义无力回应新的政治经济提出的挑战,社会主义又过于激烈,大大背离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传统。^②20世纪初,持这种见解的人自称为“进步主义者”^③(Progressives)。1916年,《新共和》杂志的“三驾马车”克罗利、沃尔特·韦尔(Walter Weyl)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从保守势力那儿借用了“自由主义”的旗号,同西奥多·罗斯福所领导的进步党分道扬镳^④,转而支持威尔逊让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做法。^⑤

自由主义者经常你说东我说西,意见互相矛盾。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多,根本称不上C.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团结的“权力精英”。但他们堪称最优秀最杰出的美国人的早期代表,是这一制度模式的第一批舵手。^⑥他们毕业于正在蓬勃发

① 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指政府只进行最低程度干预,让经济按自身原则运转。(译者注)

② 参见 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5-46, 241, 以及 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5), 8-9。

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改良主义的“进步主义运动”,要求对大型公司企业进行控制,反对腐败,推进政治民主化。(译者注)

④ 西奥多·罗斯福曾于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1912年从共和党内分裂出去,组织了进步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民主党人威尔逊。(译者注)

⑤ Roland T. Rotunda, “The ‘Liberal’ Label: Roosevelt’s Capture of a Symbol”, *Public Policy* 17 (1968), ed. John D. Montgomery and Albert O. Hirschman: 384-85. 另外参见 Gary Gerstle, “The Protean Character of American Liber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 (October 1994), 1043-73。

⑥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David Halberstr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展的各种教育机构，注重科学、管理和政策之间的联系。他们相信专业人员创造财富的能力，相信社会工程的必要性，相信个体完善的可能。他们相信美国可以最终实现财富分配的民主化，所以多罗茜·罗斯认为，他们才“容忍了高度的社会不平等和较低的跨阶级流动性，容忍了很多人都无法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现实，以期从长远上讲，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能使社会变得更平等开放，能为人创造更多的自我实现机遇。”^①他们或从商、从政，或供职于政府机构，或投身科学、高等教育，或从事各专业性工作，或致力于慈善事业，或从事新闻、社会工作，或辗转任职于其中几个领域。他们的那种自信心在当今的专业人员中已不多见。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所言所行和“美国世纪”息息相关。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历史学家们认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真正代表了更广泛的国家意识形态。小阿瑟·M. 施莱辛格之所以把美国的自由主义阵营称为“至关重要的中心”，声称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的全部经历”，原因即在于此。施莱辛格在探究自由主义者如何促使美国于世纪中期就美国模式形成广泛共识的民意时，把“美国的自由主义”定义为：与其说是一堆思想原则，不如说是各种社会进步的汇集。它更重结果，而不计方法和手段。”大约就在这同时，路易斯·哈茨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解释美国例外论的钥匙；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则使实用主义成为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正

^① Dorothy Ross, "Liberalism", i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 of the Principal Movements and Ideas*, ed. Jack P. Green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3:757.